

回眸中国出版业（一）

马敏 主编



目 录

绵延三千年的出版活动	1
新中国的出版业	39
曲折中的上升运动	59
混沌岁月	66
图书业步入新天地	76
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出版	98
毛泽东著作的出版	105
邓小平著作的出版	107
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	114
政治、法律著作的出版	137

绵延三千年的出版活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般公认有五千年的历史。书籍是文化积累和传播的主要载体。文字是书籍构成的先决条件，没有文字就没有书籍产生的可能。

先民们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由图画刻划符号逐渐进而创造出文字。最早的文字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符号，人们称它为甲骨文。这种甲骨文的作品当然还称不上确切意义上的书籍，但它已经是人们有意识地使用文字来记录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例，以便日后稽查。它开始起了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功能。从这意义上说，它是书籍的萌芽，也可以称之为幼年期的书籍。

以后又进而演化为铜刻的铭文，石刻的碑文，相应地可以称之为铜刻的书和石刻的书。严格地说，这些只能算是书的前史，算不得正式的书籍。要等到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简策出现，才是真正的书籍出世之日。

书籍产生的历史与书籍出版的历史是有联系的，但又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出版？照日本人布川角左卫门主编的《简明出版百科词典》所定的界说是：“用印刷或其它机械方法将文字、图画、摄影等作品复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并提供给众多读者的一系列活动，总称为出版。”根据这个定义，中国的出版史只能从雕版印刷算起，就是说从唐初算起，唐以前的简册、帛书和手抄的纸本书都得划在出版活动之外。这样一来，中国的出版史就要缩短一千多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出版的定义应当放宽，

雕版印刷以外的简册、帛书和手抄的纸本书都应包括在出版活动之内。因为后者虽然数量有限，但它们毕竟也起了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作用。要不然，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的经典文献如何能流传到现代？当然应该把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书籍传抄活动和雕版印刷发明以后的书籍出版活动划一条线：前者是书籍出版的前史，后者才是真正的书籍出版史。

再详细一点划分，中国的出版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到西汉是简策帛书阶段，也是第一阶段；西汉发明纸以后，手抄的纸本书逐渐代替了简策和帛书，这是第二阶段；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刻版书逐渐代替手抄本而成为书籍出版的主要形式，这是第三阶段；从十九世纪初引进西方新的近代印刷技术开始进入第四阶段。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书籍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简书，古籍上就有“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明鬼》）、“先王寄理于竹帛”（《韩非子·安危》）等记载。当时人们将竹木劈成狭长的细片，经过刮削整治后在上面写字，单支的叫做“简”，若干简编连起来叫做“策”（亦写作“册”），这就是后代迄今称一本书为一册书的起源。简策在中国使用起源很早。《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殷商的祖先已有编连的简策。考古发现的简策实物中，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的简，数量最多的是汉简。简策通常用丝绳或麻绳编连，也有用熟牛皮条编连的。简的书写用毛笔和墨，在简上写错了字可用刀削去，因此古人常以“刀笔”并提。简策笨重，书写不便，随着社会对书籍需要的增多，又出现了用缣帛书写的书籍。帛质轻且软，易于书写且易于携带。帛书的形态通常是卷成一束束的，一束就是一卷，便于

阅读和保藏。后来书的分卷就从那时的束（卷）沿用而来。帛书多已亡佚，只遗留下一些残片。一九七三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挖掘出大批帛书、帛画，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批出土帛书的形式不只是卷轴式一种，还有折叠式的。

简策和帛书的产生是中国古代书籍出版的初始时期。

中国上古时期，学术统于王官，一切文献典籍，都归统治者专有，它只供贵族及其子孙世代传习，平民百姓无权查询和受用。春秋末年，私家讲学的风气逐渐兴起，出现了私人著书、编书和藏书，孔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打破了由史官垄断文献典籍的局面，成为私人著书立说的创始者。他整理编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书，作为教材。这六部书除《乐》外，都借助于儒家师徒的传抄授受流传下来。

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及其大量著作。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医书《内经》，还有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著作，文学方面有屈原的《离骚》等名篇问世。由是“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

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秦以前的书籍除了农、医等科技书以外，有很大一部分（主要是儒家经典）失传。但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学术巨著《吕氏春秋》有幸保存了下来。汉代开国后，政府重视书籍的收集、保藏和整理工作，几次下令征集民间藏书，并设置专门抄写书籍的职官。西汉时已知道造纸，但是纸质粗劣，不便抄写。到公元一五年，东汉和帝时的宦官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造纸原料和制纸

技术加以改良、提高，使纸的质量大大改善，并逐渐推广到各地。

自从纸发明之后，简策和帛书逐渐为纸写书所代替，简策笨重不便，缣帛价钱昂贵。纸不仅便宜得多，而且抄写起来也省事。纸逐渐取代了竹简和缣帛的用途，书籍的出版就有了更大的发展。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出版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在人文科学方面，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举例而言，史学方面出版了西汉时司马迁的《史记》，东汉时班固的《汉书》，魏晋时陈寿的《三国志》和南北朝时范晔的《后汉书》。哲学方面出版了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东汉时思想家王充的《论衡》。辞书方面汉代还出版了一批解释古书词语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尔雅》和《说文解字》。文学方面出版了这个时期许多著名作家，如汉代的贾谊、扬雄、司马相如，三国时的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东晋时的陶渊明等人的赋、散文和诗歌作品。文学理论方面出版了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有萧统编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此外，农业方面出版了汉代农学家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和北魏时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天文学、数学方面首先出版了张衡的《灵宪》、《浑天仪图注》和《算网论》，还出版了汉代中国第一部天文历算著作《周髀》；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算学著作《九章算术》，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医学方面出版了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16卷（此书后经人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书）。地理学方面出版了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散文家杨 之的《洛阳伽蓝记》。

这时期，书籍开始成为商品，还出现了以售书为业的书肆。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公元前五三——公元十八年）所著的《法言·吾子》中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可见二千年前中国就已有了书籍贸易。说得比《法言》更具体的，是《后汉书·王充传》：（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生活于公元二七——九六年，从这一记载中可知当时城市里的书肆已较为普遍，书籍品种已有不少。当时还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人。魏晋南北朝时，抄写宗教经典的人很多，称为“经生”。

随着封建社会文化的发达，人民群众对于书籍的需要量日益增多，单靠手工抄写书本，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促使人们寻求增加书籍产量的方法。经过长时期的摸索和实践，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的发明也是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器可算是最原始的印制器物（含木板打印工艺）。战国时代的印玺（图章、戳子，又叫印信）不管是铸的、刻的都是反文，印出来才是正文。晋和北魏刻石碑已有阴文反写的习惯，这些都给雕版印刷术带来有力的启发。而六朝以后的拓碑应当说是印刷术的先驱。

雕版印刷术究竟起源于何时，这是学术界多年来聚讼纷纭的问题。但从现有的物证来看，认为雕版印刷术是七世纪唐贞观年间开始出现的说法比较可信。

从前人们都认为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的《金刚经》是最早的印刷品，因而断定初唐盛唐时尚无印刷术。七十年代考古的新发掘突破了这种看法。一九七五年陕西西安唐墓出土文物中发现汉文陀罗尼经咒，据专家鉴定，是盛唐时代之物。一九七四年在西安西郊出土

文物中发现一种外文印本陀罗尼经咒，据同时出土的文物推断，当是初唐之物，即七世纪初的印刷品（这两件经咒的图版首次见于一九九一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合作出版的《隋唐文化》），它比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早二百多年。一九六六年南朝鲜发现木版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专家鉴定是武则天长安四年（七四四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年（七五一年）间刊印的。由此足证中国在一千二百年前已有雕版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中国的书籍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虽然唐初已发明雕版印刷术，但使用不广。整个隋唐两代书籍的出版主要还是靠手工抄写。

隋文帝很重视文化出版事业。他曾下令借用民间书籍抄录储存，得3万余卷。隋炀帝虽是有名的暴君，但在征集书籍方面仍然继承乃父的传统。秘阁藏书竟达8.9万多卷。

隋唐时代写本书的装帧形式是纸的卷轴。隋朝末年，特别是到了唐代，卷子书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这从甘肃敦煌的发掘可以作证。敦煌遗书包括佛、道、儒家的经典、文字学、历史、医学以及诗、词、曲、日历等等，它的文字有汉文、西夏文、藏文、梵文和古代中亚细亚各民族的文字。敦煌遗书多是卷轴装，故被称为“敦煌卷子”。

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卷子书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它就被册叶书所代替。唐末出现了“经折装”和“旋风装”的书装形式。这种折叠书籍的折缝容易破裂，是个很大的缺点。到了五代和北宋，为弥补以上缺陷，就改成一叶一版的形式，把散叶装订成书，这就完成了册叶书。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虽然年代短促，但在书籍出版上成就不小。重要著作有：音韵学家陆法言的《切韵》，医学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经学家、天文学家刘焯和刘炫的《皇极历》、《稽极历书》和《论语述议》等。此外还出版了比二刘稍晚的经学家陆德明的《经典释文》30卷和《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

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朝代。特别是初唐的“贞观之治”和盛唐的“开元之治”，社会经济出现空前的繁荣，政治上也很强盛。在这基础上创造了光辉的文化，书籍出版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旺盛。

前面已经讲过，初唐已发明雕版印刷术，但没有推广使用，留下的印刷品很少，到中唐才逐渐多起来。到晚唐时，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四川、淮南、江南一带已成为全国刻本印书的中心。总之，唐代虽有雕版书的出现，但还没有代替手抄本而成为书籍出版的主要手段。可以说，唐代是手抄本到刻印本的过渡时期。尽管是手抄，唐代的出版事业发展还是很快的。文史、类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方面著作的出版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唐太宗时编纂出版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6部。唐中宗时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20卷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

文学著作有代表性的是诗歌和散文。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杜牧和李商隐等都有专集出版。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的主要著作《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也都由当时的门人和朋友编辑出版。

类书是采辑各种古籍中有关资料，把它们分门别类

地编列起来，供人查阅原文的工具书。唐代出版了有名的四部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和《白氏六帖事类集》。

唐代的自然科学成就以医学最突出，名医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共 30 卷，是一部杰出的医学著作。唐玄宗时官方编制的《开元广济方》，经唐玄宗下令大量抄写散发各地，很受欢迎。

初唐算学博士王孝通编纂出版了《缉古算经》一卷。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记载茶叶的专书《茶经》，是唐朝“茶圣”陆羽所著，全书 3 卷，分 10 篇。

其它方面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地理总志和地图。其中有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40 卷，这是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结。懿宗时樊绰著《蛮书》10 卷，是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德宗时居相位十三年。在任时曾主持各族往来朝贡事宜。他爱好地理学，常向边疆少数民族使臣及出使各国的使臣调查各地风土人情的情况，搜集各方资料，撰成《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

此外，法律方面有唐玄宗时编纂的《唐六典》。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颁行的《永徽律》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法典。唐初长孙无忌奉命主撰的《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古最系统的封建时期的法律著作。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大发展，对出版事业不能不发生影响。最重大的事件是玄奘去印度游学并取回大批佛经。他一回长安，便埋头译经，共译出经论 75 部，1335 卷。这批译作给出版书目添上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同时，玄奘还撰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至今为人们所珍视。

总之，唐代初期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使用范围有限，除经咒、佛像、历书、纸牌、报纸外，其余的书籍很少刻印本传世。晚唐时期雕版印书稍多一点，但留下的遗物微乎其微。

五代（九七——九六 年）是雕版印刷开始进入兴盛的时期，刻书出版事业比唐代大有发展。刻书地区除长江流域外，又有北方的青州、南方的福州，以及西北的瓜州、沙州。刻书者也由民间进入上层统治阶层，在民间及寺院刻书业继续向前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私人刻书和政府刻书。后唐时期，经宰相冯道、李愚等奏请，由政府主持，开始雕版印刷儒家经典著作。这无疑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书籍出版和文字传播方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将由印刷方式代替过去的手抄、刻石等笨拙的方式。

初期印刷术不免简陋，到了宋代（九六 ——一二七九年）才迅速发达起来，成为先进的技术。宋代卓越的雕版印刷技术成为后代的楷模。北宋前期毕 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 的这一发明比德国谷登堡的活版印刷术的发明早四百多年，足证中国印刷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北宋开宝四年（九七一年），政府派人到成都监雕《大藏经》。这部大书包括佛教经典 1076 部，5048 卷，共刻版 13 万块，历时十三年，世称《开宝藏》。北宋初期，政府还组织编纂出版了 4 部著名的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各 1000 卷，《太平广记》500 卷。九八八——九九四年，政府又命国子监重行校刻《易》、《书》、《诗》、“九经”，开雕《史记》等四史及《说文解字》等许多书籍。南宋政府在临安（杭州）建都不

久，就下令把各地方官署所刻书版集中到国子监继续印行，并新刻印了许多过去没有刻本的书籍。

宋代政府主办的出版事业很兴盛，中央出版书籍的机构除国子监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也都出版书籍。地方的出版机构很多，各官署、州学、军学、郡学、县学和书院等都出版书籍。国子监出版的书籍允许民间出版业租版印行，但要缴纳“赁版钱”。地方租版印造的书籍，还规定必须在书前印明工料费和赁版费，以防书商随意抬高书价。对于民间出版的书籍，也采取了保护版权的措施，经出版者向政府申请即可得到保护。如发现有他人翻版，就“追版劈毁，断罪施行”。有的宋版书上刻有“已申上司，不许复版”等字样的“牌记”，可以说是书籍“版权页”的起源。

宋代的民营出版业发展迅速，刻书地点几乎遍及全国。北宋初期以四川最盛，福建出版的数量最多，杭州、开封出版的质量较高。南宋时期，杭州的出版业更加兴盛，其中较著名的如诗人陈起、陈思父子开设的书籍铺，就出版了许多唐诗和南宋诗人的作品，以及唐宋人说部书、唐人集和宋人小集等。这些书都很有名，后人称为“书棚本”。福建刻书业主要集中于建阳和福州两地，前者以坊肆刻书著称，后者以寺院刻藏而闻名。建安余氏出版家族在两宋书坊刻书中最为突出。余氏刻书家可考者有余仁仲、余恭礼、余唐卿、余腾夫、余彦国等多人。早在十二世纪，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经书就为余氏赢得声誉，他所刻的经书，“点画完好，纸色极佳”。

宋代出版物的种类之多，几乎包括当时所有各个知识部门：举凡儒家经典、哲学、历史、地理、医药、农业、手工业、天文算法、诗文集、词集、小说、民间文

学以及佛、道经藏，应有尽有。

宋代出版的史学著作世人瞩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以及一系列《通鉴》体著作。宋代是理学盛行的时代，理学著作自成体系。它的开创人周敦颐的主要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理学的真正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的《二程全书》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集注》、《周易本义》、《太极图说解》和《通书解说》等先后出版。

宋代是文学繁荣发达的时代，诗文作品万紫千红，尤其以词更负盛名。诗、词、散文作家的代表人物欧阳修、王安石、晏殊、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纷纷结集出版，风行于世。

科技著作中最受人称誉的是沈括的《梦溪笔谈》，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百科全书。

农业书中有部奇书值得一提，这就是南宋时天台（浙江天台县）人陈旉（字景沂）编辑的《全芳备祖》前集 27 卷，后集 31 卷。有人誉之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

此外，农学、医药学、建筑学以及地方志之类的书也出版了不少。由此足证宋代出版事业发达的盛况。

宋代出版业的中心（杭州、开封、四川、福建等）也就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繁荣发达、雕版技术水平比较高和纸张的产量比较多的地方。宋代的造纸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当时一般书籍的用纸都达到了薄、软、轻、韧、细的水平，这对书籍印刷质量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版书的特色是字体大而多样化，刻印技术精良，校对讲究，错误较少，纸质坚润，墨黑如漆，装帧美观，

为后世人所称道。宋代的书籍装帧主要是蝴蝶装，有少数是旋风装和经折装，北宋早期还有卷轴形式的纸书，到南宋时又出现了包背装。

整个宋代三百多年，估计出版的书当有数万部之多。可惜历经战乱，大都毁灭散佚无存。至今国内外所存不过千部左右。

与两宋先后同时代的北方的辽和金，也出版了一些版本精致的书籍。如辽代的《大藏》（《契丹藏经》）。金代的中都（今北京）、南京（今开封）、平阳（今山西临汾）、宁晋（今河北宁晋县）出版事业都很发达。金代私人书坊很多，从事刻印出版古医书、农书和各种文艺书。金版书不及宋版书之盛，但远胜辽、夏。现存金版《大藏版》（或称《赵藏经》）已成国宝。

金版书字体或仿颜（真卿），或仿欧（阳询），古秀遒劲，刻工精良，足与宋版媲美。

元朝的统治者本是北方少数民族，素以尚武著称，先时对文化事业并不重视。但在建立了元政权之后，先后采用了尊经崇儒、兴学立教等一系列文治措施，使得元代刻书出版业比前代不但没有倒退，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前进和发展。

元代官府刻书出版机构，中央有秘书监的兴文署、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局及太医院的广惠局和医学提举司。官刻本以兴文署的刻本最著名，其中最早、最好的刻本是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一年）刻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地方官刻以大德至元间九路所刻十七史最为著名。在元朝地方刻书中，书院刻本更有影响。而私人刻书比宋朝也不逊色，他们刻书非常认真，刻本往往优于宋版。元代的坊刻比官刻、家刻规模更大，福建

建阳县沿袭宋代刻书风气，仍是书坊聚集的地方，刻书最多。山西平水原是北方金国的刻书中心，元代继承下来，并有发展，所刻书籍仍称“平水版”。

元代刻书的内容，除当时士大夫所诵读的经、史书籍而外，纂图互注本的经书和子书、类书、字书、韵书，以及各种经书的新注、史书的节本、科举应试的参考书、模范文章选集等刻印数量可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私家及书坊所刻医书开始增多，仅建阳余氏勤有堂就刻了《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新编妇人大全良方》、《普济本事方》等多种医书，燕山窦氏活济堂乃是专门刻印医书的书铺。元人的诗文集及戏曲小说当时刊刻的也很多，但留存下来的不多。据清代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的不完全统计，元代刻印、流通的图书，共 3142 种。历时不到百年的元朝，能刻印如此之多的图书，其成就不能不说是很可观的了。

元版书的字体多用赵体。赵体字秀媚柔软，比宋体字圆润。元代出书数量不及宋代，但刻印技艺继承了宋代遗风，有的书版由书法家亲笔誊写，赵孟頫等人就做过这种事，其作品可谓精美绝伦。元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了朱墨两色套印。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年）中兴路刊印的《金刚经注》是最早的两色套印本。

元代在出版印刷事业上有一重大的贡献，就是元成宗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王祜创造了木活字，并且发明了转轮排字架，提高了印刷工效。

到了明代，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很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想方设法促使书籍出版事业不断前进。整个明代二百七十多年，是图书出版事业大发展的时期。

明初，南京国子监将杭州及江南各地的宋元书版集中起来继续印刷出版，号称“南监本”。杭州不少刻书的技术工人也随西湖书院的书版到了南京，南京即代替杭州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出版中心。十六世纪中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大量出版插图本的小说、戏曲书籍。邻近的安徽徽州及福建建阳等传统雕版地区的熟练技工，也纷纷来到南京。南京又成为木刻彩色套印的中心。出版的繁荣促进了图书贸易的兴盛，当时南京的三山街和内桥一带，书坊林立，图书的销售量很大。

明代官刻本开始有内府刻本，由司礼监的宦官掌管。司礼监经厂库设提督总管其事，所刻的书多为制诰律令及经史文集等，称为“司礼监本”，又称“经厂本”。多为大字巨册，版式宽阔，行格疏朗，大黑双边，正文、小注断句处都加圈，用上好洁白棉纸和佳墨精印，装帧华美，但多数校勘不精，错讹较多。明代中央政府各部门都刻书，钦天监、太医院也刻有本专业的图书。明代政府编纂的《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全书辑录古籍七八千种，计 2.2937 万卷，约 3.7 亿字，装成 1.1095 万册，全部工笔手写，精美绝伦。

明代地方官刻本也很普遍。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府县、儒学、书院、监运司等，都刻印了不少书籍。各藩王府也刻书，称为“藩府本”或“藩刻本”。藩府所刻的书，多以中央赏赐的宋元善本作为底本，加上他们具有优厚的物质条件，而且藩王本人也有一定的学识，因此所刻书中有不少为明代官刻本中的上品。

明代私刻本主要分布在江、浙两省。不少私刻的主人都是大藏书家，他们都很注重采用善本并精加校勘，所以书籍质量较好。

明代书坊刻印的书，品种繁多，大多以供应人民大众日常所需的实用书为主，也翻刻了不少宋元旧书，唐宋人的文集则出有新版；还出现一些专刻小说、戏曲的书铺。明代中后期，有些书坊将编辑、出版、发行合为一体，根据市场需要出版群众急需的图书，不仅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竞争力，也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最著名的是常熟毛晋的汲古阁。他聘请有学识的编辑（经部 13 人、史部 17 人）参加编校工作，还雇用 20 名印刷工人。三十年间刻书约 600 多种，出版 10.9 万多页，校刻 3000 万字以上。有不少宋代刻本，靠汲古阁翻刻才得以流传下来。所刻的书大部分有毛晋写的跋语，介绍书的作者、版本情况及优点，因此，汲古阁本受到人们称誉，销行很广。

明代刻书的内容多种多样。儒家经典方面，洪武年间颁布了钦定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文字学方面有钦定的《洪武正韵》。经、史由南、北国子监雕版印行。成化、正德之间书坊刊行的类书增多。嘉靖以后，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翻刻宋元旧书的风气日益兴盛。唐宋人的文集都有了新版。万历以后，传奇、戏曲小说刊行日多，这方面的新著作不断问世。新编的类书、丛书日渐增多。类书、丛书的编刊，最初多是对古书的节录，如《说郛》、《宝颜堂秘籍》、《格致丛书》；后来便发展为古书的汇编了，如《津逮秘书》等等。由于各种文学流派的不断出现，刻本个人文集、诗文选集也层出不穷。地方志的编纂与刊行比宋元时代更加发达，刊印了许多方志书。佛经方面有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刊刻的南藏，永乐八年（一四一一年）刻的北藏，至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年）又雕刻了续藏 410 卷。道经方面有